

美国的灾难社会学掠影

戴 可 景

灾难社会学是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以灾难及灾难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目前我国社会学界对灾难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对灾难开展社会学的探索将为研究灾难对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如社会组织的产生和起源,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以及灾难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丰富的知识。古典社会学家及早期从事灾难研究的学者认为灾难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之一,对灾难的社会学研究,包括对灾难本身的起因、范围、后果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有效地预测灾难,并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某些灾难,及时制止灾难的蔓延,减轻灾难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本文概略地介绍一下美国的灾难社会学研究状况。

一、关于灾难的定义和性质

美国学术界对灾难的定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的,它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补充和修正的过程。最早,对灾难的概念认识比较强调具体事件的后果,突出事件影响所及的时间长度,以比较不同灾难所造成的不同后果。有一些研究人员则着重分析灾难的物质方面,比较重视预防灾难和减轻潜在的灾难所可能造成的社会损失。后者往往把灾难仅仅理解为“自然灾害和技术性灾害”或是“极端困难的环境”等等。尽管初期对灾难的概念有所争议,但多数学者所说的灾难是指意外发生的对人类社区构成问题和物质影响的破坏性事件。这些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伤害居民和物质环境的明显特征。事件的发生是突然的、紧急的。一般地说,在事件发生前后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以减轻它们的后果。美国灾难社会学家巴顿(Barton)把灾难描述为一种情景,在这种情景里,“社会系统中的许多成员得不到该系统中应获得的生活条件”。后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异感型(Bissensustype)灾难和同感型(Consensustype)灾难的概念。所谓异感型灾难是指人们对于有冲突的环境的性质、起因和解决办法存在着全然不同的观点,20年代后期美国和西欧大学校园中的骚乱事件即属此类。同感型灾难即指人们对于发生的事件的解释、评价及采取何种对策的意见比较一致,自然灾害和技术事故多属此类。

目前美国灾难社会学界公认比较准确的定义是弗里兹(Fritz)提出的概念,它有四个核心内容:(1)灾难发生的时间和空间;(2)灾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3)所危及的社会单位;(4)社会单位作出反应或措施。事件的规模因当事人界定的范围而异,社会影响包括对社会单位带来物质损失及其正常职能的破坏,社会单位是指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这一概念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灾难的社会性质,它取代了过去单纯强调物质性的定义。然

而,也有一些学者指出,过份强调特定时空观念易导致将一些牵延性、弥漫性或扩散性的事件如饥荒、流行病等排除在灾难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强调把西方某些具体事件作为识别灾难的特征是一种亲西方、亲技术、亲资本主义的偏向,不适于识别发展中国家的灾难。他们坚持灾难本是一种内在的政治现象的观点。另一些极端的评论认为,灾难这个词是一种过时的概念,与现代世界中出现的恐怖事件相比,它是无足轻重的一种现象。总之,关于灾难的概念仍有争论,但至目前为止弗里兹所作的定义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灾难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可目击的、对社会或社会子系统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或对其正常职能的破坏,它的起因和后果均与社会结构、社会进程或社会子系统有关。

二、灾难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美国,对灾难的研究大致始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对社会危机和灾难的研究尚不多见,理论匮乏,有关文章被视为一般社会问题的研究,因此不为人们所重视。这一时期是灾难研究史的萌芽时期。直到1961年弗里兹在题为《灾难》一文中总结了二次大战以来灾难研究的成果,提出了诸如灾难的功能、扩大灾后社会重整的效应等问题,并提出这种重整效应可以使受灾地区的整合、生产率和发展达到受灾前的水平等观点以后,灾难社会学才逐步受到了有关学者的重视,并开始了某些探讨。这种探讨仅限于历史上某一地区灾后的社会的运行、计划和行政管理问题,其研究对象也往往局限于自然灾害。

自70年代开始,社会学对于灾难的研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继弗里兹以后,巴顿于1970年在《灾难中的社区》一书中首次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灾难中有关个人行为的基本问题,例如角色定义、角色能力和危急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角色冲突等等。巴顿提出了一系列假设,把人的动机、危急情况下应该做什么的有关知识和社会关系的存在等三种因素与灾难中可能产生的角色联系起来。该书还提出了灾难中个人行为和组织性行为的协同问题。在书中,巴顿着重分析了有组织的动员与紧急状态下个人行为的不适应性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还用理论模式来阐明并预测治理社团(therapeutic Community)的产生以及与这种社团有关的影响个人行为的一些因素。他提出的79个命题中有39个探讨个人层次的关系,23个探讨结构性关系,9个讨论集体关系。命题由简到繁,由浅到深。

巴顿的文章当时被认为是一篇相当突出的论文。他成功地用社会学观点重新分析了各种不同的研究人员所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人员的生活条件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科角度不同,他从各种不同的观察和发现中找到了共同的因素,从而导出了可供验证的假设和一些大的理论框架。虽然他自己认为这些假设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坚实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但仍被学术界视为70年代灾难研究著作中真正具有社会学观点的著作。他为有志于深入探索灾难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论证的假设。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巴顿本人偏爱社会调查型的定量研究,但他提出的可行性研究,也并非都需要这种特殊的研究技术。

1974年,戴恩斯(Dynes)主编的《灾难中的组织性行为》一书,介绍了美国灾难研究中心成立以前发生的250例灾难中的组织性行为。它着力分析了灾难对于美国社会中正式组织的影响。书中认为,对于如何进行人员的有组织的动员、征集和开展适应环境急剧变化的工

作等问题的研究，最好是把对灾难作出反应的群体分成四种类型来考察。这四类群体是：

(1) 已完善的群体；(2) 正在发展的群体；(3) 外延的群体；(4) 应急的群体。书中还描述了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通过某些亚系统之间的合作而产生的灾难社区结构。但关于低层次的单位如家庭、个人和高曾次的单位即整个社会对于灾难的反映的研究，在该书中涉及甚少。

1975年出版的题为《从社会学观点看人在极端环境中的组织系统》一书探讨了人（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对自然灾害及其它灾难如何作出适应性反应的问题。它研究了与灾难有关的人的各种活动，如准备、警戒、受到冲击以及冲击后期的情况等。该书选材系统，有层次，从个人、小群体到组织、社区、社会直至国际之间。书中还对不同层次的灾难研究的不平衡性作了量的分析和描述。大部份成果是研究个人层次的，其次是社区，共有1399项变量。该书至今仍不愧是一本试图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描述灾难中各种不同的社会行为和人的行为的知识性书籍。

1976年戴恩斯和夸伦特利 (Quarantelli) 发表了《危机时刻有组织的信息与选择》一书。主要分析了35起灾难，提出了249个命题，其中126个把抉择作为因变量，31个把抉择作为自变量，101个把信息作为因变量，46个把信息作为自变量。1977年斯托林 (Stalling) 运用戴恩斯提出的四种群体分类法进行研究并为18个组织层次上的命题作了经验论证，证明外延群体或组织不易受与危机有关的组织的有效控制。经验研究还证实了完善的群体内部的小单位自主程度越大，在灾难中越不易有组织有结构地完成工作。由此，斯托林把灾难中的组织性行为分类与社会学的组织理论联系起来。他发现灾难中大量需要特殊技术的有组织的工作大多由完善的群体承担，而大量的一般性任务则由应急性群体承担。正在扩充的群体和外延的群体或组织则居两者之间。

灾难社会学家所探讨的课题还有：救灾工作中的军民关系；发展中的组织或群体在社区灾难中的作用；社区在灾难中的职能；救灾工作中的警卫部门；自然灾害中的地方民政工作；灾难情况下的警戒系统；灾难中的信息流通；自然灾害中的社区冲突；疏散与恐惧行为等等。此外，美国灾难研究中心还在进行抢救与反社会行为，疏散与被疏散者，应急医疗服务及应急心理治疗等问题的系统研究。

三、灾难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综观灾难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研究重点从社会心理转向社会组织

早期的研究，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国家舆论研究中心所做的一些研究，比较强调社会心理，如对恐惧心理、个人衰败、反社会行为的研究。60年代初经弗里兹的倡议，国家科学院资助的一些研究逐渐将重点转移到了社会组织。1963年，美国灾难研究中心成立，主要研究社会组织。70年代初，巴顿的著作加强了这一趋势。之后，在整个70年代，除少数例外，大多数社会学家进行的灾难研究着重研究灾难中的组织。这就使过去研究工作中的不平衡性得到了纠正。社会学家应当从社会背景、社会结构方面而不是个人心理方面着手研究。

2. 研究对象从个人转向群体

70年代中期，灾难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开始从个人转向群体。以群体或社会组织为对象的

研究日益增多。这一变化使理论和方法都发生了某些基本的变化。许多研究人员接受了弗里兹的倡导，认为对灾难作出反应的效果和效率更多地取决于灾难中应急组织的产生及其生存能力而不是受害者的心理准备状态，因此，所有与灾难应急有关的组织几乎都应在研究之列。

3. 系统概念运用的增多

从事灾难研究的社会学家日益倾向于接受系统概念。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参加与灾难有关活动的计划人员和现场执行者认为，他们本身即是一种“人员系统”。其次，研究人员和理论工作者认为，在灾难研究中运用系统概念有益于对灾难研究进行多学科的理论探讨。他们提出了“系统压力”概念，并认为可用它来考察任何一个系统层次上的压力后果。而且，多层次的系统是相互渗透的，如心理压力对生理功能有影响，组织压力对某社区权力结构有影响。这一观点实质上是认为灾难是受到正在运行中的系统的影响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反过来又影响到系统的运行。第三，在发展救济事业中，大多数人认为救灾服务不应零打碎敲，应通过一套横向连结或纵向贯通的组织系统来进行。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集中相当的力量来创建精神健康服务系统和医疗护理服务系统。当研究、计划人员和现场指挥人员提出“××系统”对某灾区提供了什么样的紧急医疗服务时，就意味着包含在“××系统”内的整套医疗服务。他们要求的答复是“××系统”在提供服务时的效果和效率如何。

四、灾难社会学界的结构趋势

1. 灾难研究同社会学家和研究资助人的关系

多年来，美国灾难研究的经费来源不稳定。国家一级对灾难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动力主要来自少数与国家科学院有关的社会学家。这些社会学家在50年代后期首先组创了灾难研究小组，并在应急计划顾问委员会及有关的院校委员会服务，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有社会学家查理士·弗里兹。他的研究人员身份加上他对科学团体和国家机构的知识使他在维系研究团体、研究成果的潜在应用者与研究项目资助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过去由于救灾的职责分散在联邦机构的各个层次，对灾难研究的支持者也是分散的。这难免使研究产生一种倾向，即如技术人员主张研究与训练有关的课题，工程师则偏爱对工程事故的研究等等。社会学在许多政府机构中一度得不到应有的席位和代表性，因而也难以向支持灾难研究的部门推广他们对救灾和灾难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技术。50年代，支持对灾难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仅有少数机构，如民防部办公室和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等。

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对灾难研究的兴趣倍增。政府对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达了许多应用研究的任务。一些有丰富实地调研经验的社会学家被指定来指导新的研究项目。特别是60年代后期美国大学校园的骚乱激起美国政府越发关心掌握各种“紧急事件”的对策，并纷纷向社会学研究者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联邦政府增加了许多通常由立法规定的向地方当局提供救灾服务的任务，这使很多机构对于社会学家无论是在政策咨询或提供服务的效率方面能作出何等的贡献发生了相当的兴趣。即使是一些未直接得到政府资助的灾难研究，有些政府机构也向社会学家提出咨询。为促进地震预测技术的突破，原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被任命为地震预测

公共政策小组组长，小组还包括其它两名社会学家。

2. 灾难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机构

60年代以前，灾难研究一般分散在各种机构中。各项目之间联系不多，连续性也较差。美国第一个灾难研究学术机构——灾难研究中心于1963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成立，它的研究经费的来源是多方面的，而且可延续使用一个时期，因而它得以维持一个实地研究队伍，以备发生危机时迅速开展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研究并建立和开辟资料基地及专业图书来源。该研究中心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关系密切，有数十名研究生。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积极从事灾难社会学研究并对灾难中的社会行为发生极大兴趣的社会学研究人员都曾经是灾难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接受过灾难社会学的训练。这些社会学家也都曾在灾难研究中心供职。

1966年原灾难研究中心付主任在科罗拉多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所开展了一项警戒系统与气象变化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同时对自然灾害研究进行大量评估研究。该大学坚持多学科的训练和研究，而社会学家从中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所的人员曾在外国进行过多次灾区实地考察。该所的出版物是应用性较强的多学科刊物。

3. 灾难社会学研究的队伍、出版物及有关会议

美国早期从事灾难研究的仅有一、两名教授和研究生。他们的成果往往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例如灾难研究中心对阿肯色龙卷风灾的研究成果从未能得到公开的出版而只以总结报告的形式提供给资助机构。灾难研究人员极少有机会迅速地见到该领域的其它成果。60年代以前对灾难研究有直接的实地经验的社会学家不足20人，到70年代中期，灾难社会学研究人员数量增加了8~10倍，论文数量从1961年至1976年增加近3倍。不久，灾难社会学研究情况在美国社会学年会全国会议、数次地区性会议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灾难社会学研究出版物的数量大大增加，成果的形式有发表在正规的社会学杂志、多学科综合性杂志上的论文及各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出了灾难研究专辑。国际社会学学会资助出版了专著，《灾难》杂志多发表跨学科对灾难的研究成果。美国灾难研究中心、英国布雷德福大学灾难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州行为科学研究所分别出版的几种灾难社会学通讯为：《意外事件》、《灾难研究》及《自然灾害观察家》。

灾难社会学研究力量的加强，成果与信息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各种专业性国际会议的召开都表明，一个灾难社会学研究的国际网络已经形成。1972年美国灾难研究中心召开了为时一周的日美合作研讨会，有数十名社会学家参加。1975年巴黎灾难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也召开过国际会议。此外，还有日意灾难社会学合作研究会议。国际合作旨在交流研究成果，传播预测灾难、减轻灾难后果的经验。在这方面，美日之间有关地震预测及减轻震灾损失的经验交流活动是名列前茅的。由此也不难看出灾难社会学的跨文化协作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

五、灾难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方向

1. 加强经验研究，促进理论建设

美国社会学界认为，从总体看，20多年来灾难研究的理论建设不够，经验研究多以中程理论为基础，没有重大的突破。对应急群体的研究多运用集体行为理论；许多灾难预警的研

究则以符号互动论为理论框架,对复杂社会组织的研究往往用一些现成的组织理论。因此,如何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社会学家特纳(R. X. Turner)对紧接灾后出现的典型的社会凝聚力进行了反复的观察并提出重新按迪尔凯姆关于机械和有机团结理论进行解释。总之,美国灾难社会学界一致建议首先应从经验研究中建立新的概念和理论,其次是用经验研究进行论证,然后还需通过经验研究提出今后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这种研究积累的基础越坚实,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理论价值就越高。

2. 充分开展多学科灾难研究

在灾难研究领域,多学科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成果并付诸应用的观点未得到应有的支持。不少美国社会学家认识到过去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某些研究领域,例如对于两名政治学家提出的唯一的基于经验研究的论文和沃大利亚一些颇有声望的政治学家的观点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学者认为一切灾难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政治性质,对此,美国社会学家未作出任何反应。美国社会学界认为,被忽略的还有商业界与灾难的关系。关于灾难中的公司、企业和工会组织的研究和论文十分少见。商业团体对灾后的恢复和重建虽然甚为重要,但除全国灾难研究中心有一些未发表的关于银行、储蓄、借贷方面的资料外,美国社会复杂的金融系统与灾难的关系这一课题尚未得到社会学的研究。灾难社会学家夸仑特利与戴恩斯指出,即使是在相当有基础的知识领域,对灾难的研究不能不说没有空白,例如关于个人对警报的反映的资料已十分丰富,然而如何通过灾难中涌现出来的应急组织来实现警戒过程的研究还很少有人进行。有关医院实施救灾服务的研究不少,但如何妥善处理尸体,几乎是个未被问津的课题。一般地说,其它学科对灾难研究的成果往往被贬低为“仅高于一般常识”的水平。因而,学术界号召,为了学科本身及学科服务对象的利益,社会学家在继续对灾难作出高质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应适当注意跨学科的研究。

3. 反复验证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由于灾难研究的特殊性,一般地说,许多研究结果都是以对一、两起在特定时空和环境下发生的灾难的调查研究为依据的。研究人员又往往爱好探索新的问题,在某次灾难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很少再被置于另一些灾难研究中去考察和验证。因此,美国灾难社会学家们强调,需要加强经验研究,反复考察和验证已知有争议的,但尚未得出确切的结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有不少研究表明在美国的灾难中很少有抢劫行为,但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观察到其它社会的灾难中有抢劫行为,原因据称是这些社会灾前关于财产安全的立法规范与美国不同。虽然多数社会学家认为在一切灾难中都很少发生抢劫案,但却缺乏资料来支持这一观点。目前的研究基本上只能说在美国或其它西方社会的灾难中抢劫案是罕见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灾难中人的精神健康问题。研究证明,美国一些典型中等规模的灾难发生后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精神病人。然而在某些零散的工作中却发现真正的大规模的灾难对精神健康会造成不同的后果。社会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在对布法罗湾水灾后社区结构破坏的分析中提出,目前被普遍接受的灾难不会使精神失常的概括应作某些修正。他认为只有对不同社会发生的灾难进行反复的研究以后,方可作出上述结论。

美国社会学家还认为,其它国家的灾难研究的结论与美国雷同。例如英国关于一个工厂爆炸的研究,日本对一个夜总会大灾的研究,菲律宾对家庭遭灾后搬迁行为的研究,其结论均未对美国同类研究提出异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结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今后尚需有更多的交叉文化研究才能对灾难中的人和社会行为作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下转第124页)

治以后的近代化对农村不利，农村就对城市反感。只是到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农村开始变化，反现代化的人才少了。

会上，中、日学者还就现代化中“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富永教授谈到，日本能够比较平等的最初起源在于二次大战后的改革。所以，开放不一定带来新的不平等，这可以从日本的改革中得到启示，造成类似日本战后那样的条件，以避免新的不平等。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从“前现代化”（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化，需要有一段积累。而在积累过程中，必然造成差距的拉大。资本主义工业化就造成了这种情况。缩小必然先经过一段分化后才能实现。日本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不但国内的差距拉大，而且积累也在剥削了亚洲各国，主要是中国。因此，他认为日本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还不能适用。中国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产生了一个矛盾，即现在加大的差距与设想的后来收入差距的缩小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问题，资本主义并没有遇到。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中心的岳颂东也认为，从他们调查了解的情况，当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公平分配问题还不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确实解决多劳多得。

在会上中方张琢等学者回答了日方富永健一等学者就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儒学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改革者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所提的问题，具体分析了客人问及的康有为的思想变迁和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孙中山的思想的来源，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等问题。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丹青、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田茂人等学者。讨论会形式活泼，答问中肯，与会各方都感到很有收获，会后和休息期间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谭 深）

（上接第121页）

此外，美国社会学家在对灾难作政策性研究时，往往受行政的支配，行政有权决定承担研究项目的学科，决定优先研究的课题及研究方法。各学科研究人员难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本文主要参考材料：

1. 夸伦特利、R.R.戴恩斯：《对社会危机与灾难的反应》，美国社会学年度评论，1977；
2. G.A.克雷普斯：《社会学探索与灾难研究》，美国社会学年度评论，1984；
3. R.R.戴恩斯：《灾难中的组织性行为》，俄亥俄大学灾难研究中心出版，1974；
4. T.E.德雷贝克：《灾难对家庭职能的长期影响》，丹佛大学出版社，1973。
5. C.E.弗里兹：《灾难》，戴R.默顿编辑的《社会问题》一书，纽约哈尔考特·布鲁斯与世界出版社，1961年。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严立贤